

中美新定位:大国相处之道的探索

张旭亮 张海霞

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美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面对面互访。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

为什么是现在? 读懂新定位的历史、现实、理论逻辑

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

中美建交47年,关系历经起伏,但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从55年前乒乓外交推开冰封20多年的大门,到50多年前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再到建交以来的风雨兼程,历史一再表明,两国关系每一次走出低谷,靠的都是回到正确的战略认知、回到相向而行轨道。新定位正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理论提炼。

过去数年,中美关系经历贸易摩擦、科技脱钩、地缘对峙的深度震荡,2025年关税战一度将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推至三位数,两国和世界都付出了代价,市场和民众对确定性的渴求空前强烈。中美力量对比和相互依存的现实决定了任何一方都无法以压制另一方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据海关统计,2026年一季度中美货物贸易同比下降18.7%,二季度转为同比增长13.7%。这一变化固然有低基数、补库等因素,但元首共识对稳定市场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定位正是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回答关系向何处去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由止跌企稳迈向建设性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存在一种悲观判断,认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权力转移往往以冲突收场。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新定位正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系统回答。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新定位首先就是一次战略认知的校准,以合作为主替代竞争主导,以相向而行替代零和博弈,从根本上否定了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的错误逻辑。

建设性、战略、稳定:打开新定位的三把钥匙

理解新定位,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建设性、战略、稳定三个关键词及其相互关系。

稳定是新定位的核心范畴。在国际安全理论中,战略稳定是源于冷战核军控实践的概念,其经典内涵包括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新定位对这一概念作了创造性转化。一是稳定的范围,从核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经贸、科技、人文、全球治理的关系全局。二是稳定的基础,从波动平衡转向利益交融和相互尊重,稳定不再靠彼此的恐惧维系,而是靠共同利益的不断扩大和对彼此核心关切的尊重来支撑。三是稳定的性质,从危机管控向建设性稳定,不再满足于避免最坏结果,而是致力于塑造最好可能。需要特别强调,稳定不是静止,而是动态平衡。一个有韧性的关系,允许摩擦存在,但不允许摩擦升级为对抗;允许分歧存在,但不允许分歧绑架全局。

战略规定了稳定的层级。一是全局性,着眼中美关系全局,不以某一领域、某一议题的得失定义整体关系,不为一时一事所左右。二是长远性,着眼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超越选举周期和短期利益的算计,为关系提供可预期的时间框架。三是顶层性,由两国元首直接引领、共同确定,以最高政治权威为稳定提供保障。战略一词还蕴含着对中美关系性质的判断: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稳

定不仅是双边事务,更是牵动国际体系稳定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建设性规定了稳定的性质和方向。建设性有三层含义:一是积极性,稳定要靠合作不断增强,而非靠互不干扰勉强维持;二是共建性,稳定不是一方施予、另一方接受的安排,而是双方共同投入、共同塑造的成果,双方都是建设者,也都是受益者;三是过程性,建设性稳定不是一次会晤就能达成的静态结果,而是需要持续投入、不断积累的制度化过程。

稳定是状态规定,回答关系处于何种状态;战略是层级规定,回答在何种高度和时间尺度上把握这一状态;建设性是性质规定,回答这一状态朝何处发展。三者合一,构成一个状态明确、层级清晰、方向可辨的关系框架。

合作给动力,竞争划边界,机制控分歧,和平守底线

新定位的核心要义,可从四个维度把握:合作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四个稳定”不是四句并列的口号,而是一个覆盖大国互动全谱系、层层递进的系统框架。

合作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是新定位的主基调和动力系统。合作为主,首先是对中美关系性质的定性判断。这一判断的现实基础是两国利益的深度交融。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货物贸易规模居世界前列;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数量以万计,据相关统计,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深度交融的利益结构意味着,任何一方对合作的破坏都会反噬自身,合作本身就是最有力的稳定器。积极二字揭示了稳定不是靠互不干扰勉强维持的消极状态,而是靠合作不断增强关系韧性的积极过程。合作越深,共同利益的存量越大,破坏稳定的代价越高,稳定的根基越牢。北京会晤以来,双方同意加强贸易和投资领域机制化沟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扩大双向贸易,启动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华盛顿会晤前后,双方延长经贸休战安排,就人工智能安全事件建立通报渠道,在执法、卫生、农业、人文等领域持续拉长合作清单。这些安排不仅在于具体成果,更在于以机制化合作为稳定提供持续动力。

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是新定位的边界条件和边界系统。大国之间有竞争不足为奇,问题不在于有无竞争,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在何种范围、为何种目的竞争。良性稳定的核心要求是不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全局,将竞争从关系的定性降为关系的一个变量,从而为合作留出空间。有度是良性竞争的规定性所在。有底线,就是不损害对方核心利益,不把竞争引向对抗;有边界,就是竞争限于特定领域,不外溢为全面对抗;有节制,就是不人为设限、不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取所谓优势。以人工智能为例,中美应当比的是如何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完善全球治理,而不是筑起新的技术壁垒、重演大国军备竞赛的旧剧。

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是新定位的运行机制和机制系统。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分歧客观存在、长期存在,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消除。关键在于消除分歧,而在于让分歧处于可控状态,让关系不再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常态二字点明了这一维度的制度化取向。实现常态稳定有三重要求。一是政策连续,不因一时一事推翻既有共识,以政策的连续性为对方和市场提供可预期的行为模式。二是信守承诺,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承诺的可信性是相互信任的基础,也是机制运转的前提。三是机制解决,政治外交渠道和经贸磋商机制持续运转,两军沟通渠道保持畅通,分歧发生时用手转化为新的进入门槛。有预期可循,通过不断压缩问题清单使分歧处于可调试、可改善的状态。可控不等于消除,而是以正面预期为各自发展和国际形势提供确定性。

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是新定位的最终底线和底线系统。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持久稳定的前提,在于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的发展权利。可期二字表明,和平不是侥幸,而是有条件、有保障、可预期的。从北京会晤情况看,美方了解中方立场、重视中方关切,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这为和平可期提供了现实依据,但也需要美方以持续的行动加以验证。

四个稳定的内在关系是,以合作提供动力,以竞争界定边界,以机制管控分歧,以和平守住底线。这种既递进又互为前提的结构,使四个稳定构成一个逻辑自洽、功能完备的有机整体,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既有活力又不失控的系统性框架。

从竞争主导到合作为主,中美关系怎么走

同历史上中美关系的各种定位相比,新定位在关系定性、稳定内涵、治理方式、生成方式四个方面实现了转换,标志着中美关系从一方定义另一方转向两国共同定义,是对大国相处之道的一次范式性探索。

一是关系定性从竞争主导转向合作为主。过去若干年,美方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对手,导致两国关系陷入严重困难。新定位明确合作为主、竞争有度,把竞争从关系的定性降为关系的变量。

二是稳定内涵从消极稳定转向积极稳定。传统战略稳定以相互脆弱性为基础,以避免最坏结果为目标,是一种威慑对峙状态下的稳定。新定位将稳定建立在利益交融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以合作增强韧性,以建设塑造未来,将稳定从被动防御的对峙状态转变为通过主动合作、有效管控和共同塑造实现的动态平衡过程。

三是治理方式从危机管控转向预期管理。过去的稳定多是危机发生后的被动止损,稳定是事后状态。新定位将稳定前置为事前承诺,通过锁定政策连续性,明确行为边界、建立机制安排,主动塑造双方和国际社会的预期。预期管理的意义在于,可预期性本身就是安全的来源,当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底线和行为模式有稳定预期时,误判的空间就会缩小,安全困境的螺旋就会减弱。

四是生成方式从单向倡议转向双向共识。历史上关于两国关系的定位,往往一方提出、另一方保留,难以转化为共同行动。新定位是两国元首共同赞同的重要政治共识,已进入两国外话语,并成为中美相关对话沟通的重要议题,为落实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和操作基础。双向共识的价值不在于双方理解完全一致,而在于双方有了共同的目标语言和评价标准,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互动不断丰富内涵、缩小认知差距。

四重转换的世界意义在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中美以建设性战略稳定替代零和竞争,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重要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有助于缓解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焦虑,也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提供了可供检验的现实路径。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从北京到华盛顿,从共识到行动,新定位反映现实、体现期许,正在经受实践的检验,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以战略为舵,把准方向不偏航;以建设性为帆,汇聚动力不失速;以稳定为锚,守住底线不倾覆,中美有能力、有条件把愿景转化为行动,穿越风浪,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导;浙江工商大学社科院院长、教授、博导)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碳市场正是把这一重大命题落成制度的一个样本。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到“让碳有价”的机制,中间隔着的不仅是一套技术系统,更是一条把生态文明思想转化为治理实践的逻辑链条。坐落於武汉的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中碳登),五年多走通的正是这样一条链。截至2026年9月,全国碳市场碳配额累计成交9.73亿吨、累计成交额668.86亿元,成交规模持续扩大,开市五年多实现零故障、零中断、零差错。

“两山”之间,需要一座什么样的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生态本身就是价值,保护生态就是创造价值。但绿水青山不会天然地变成金山银山,二者之间需要一座“转化”的桥。碳市场恰恰提供了这样一座桥。

从经济学上看,碳市场本质上是把碳排放这一“负外部性”内部化,把原本免费、无价的大气环境容量,确认为可登记、可交易、可结算的稀缺资产。这一过程正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题中之义:让看不见的生态价值,获得看得见的市场价格。中碳登承担的正是这一“确权”与“结算”的制度功能——它用一套严格的登记、交易、履约规则,把“减碳”从道义倡导变成了价格约束。

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只靠觉悟,还要靠制度;不能只算生态账,还要算经济账。碳市场正是把这两本账合成了一本。马克思早已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对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投射。从“向自然无限索取”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文明观的一次深刻跃迁,碳市场正是这一新的文明观在经济领域的制度表达。

政府划“天花板”,市场定“谁减排”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发挥政府作用,又要运用市场机制,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论断在碳市场领域得到了具体印证。

碳市场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典型样本。政府负责“定总量、分配额、立规则”,市场负责“发现价格、配置资源、激励减排”。政府划定了碳排放的“天花板”,市场则决定了“谁减排、减多少、花多少钱减”。二者各司其职,相得益彰,避免了单纯行政命令“一刀切”的低效,也克服了纯粹市场“唯价格论”的短视。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确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实现碳市场法治化建设的关键突破。

还要看到,碳市场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大气环境容量,是这一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碳减排不能孤立地抓,而要放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的全局中来把握。碳市场把大气环境容量纳入交易,正是把“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要求,落成了一套可计算、可执行的制度。

中碳登五年多实践,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生动展开。它既是政府意志的“基础设施”——承载全国碳市场的确权、登记、结算,把国家的减排目标分解为每一个控排主体的具体约束;又是市场运行的“制度底座”——以清晰的产权和可信的结算,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减排动力。这种“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格局,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降本增效”到“降碳增效”,现代化怎么走

从更宏阔的视野看,碳市场承载的远不只减排的工具价值,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大论断的落地实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而要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碳市场所推动的“降碳增效”,恰恰是这条道路的现实路径。当“碳”进入生产成本,企业的创新便不再只是“降本增效”,而是“降碳增效”,这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在一致,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统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碳市场看似是机构之间的交易,其落脚点却是人民群众的蓝天、碧水、净土。它让减排的每一分努力都有价可依、有账可算,让“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从理念走向日常。

更进一步,碳市场还连着“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同议题的今天,碳定价能力日益成为参与全球绿色治理的重要基础,在全球碳定价规则形成中赢得更多话语空间。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正值中碳登五年运行实践,也是“双碳”目标从“探索”转入“攻坚”的关键期。把碳市场的“账本”做扎实、把碳定价的“枢纽”做起来,是武汉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担当。

把“碳账本”做扎实,把“碳定价”立起来

全国碳市场从无到有、从起步到扩围,五年多时间走过了不平凡的路程。中碳登的实践说明,碳市场不是简单的交易工具,而是连接生态文明理念与治理实践的枢纽。它把国家的减排目标转化为企业的成本信号,把生态价值转化为市场价格,把绿色发展的要求转化为经济主体的内生动力。

也要看到,碳市场仍处于完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如何让更多行业平稳纳入,如何增强价格信号的有效性,如何更好统筹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期,都是需要继续回答的问题。让“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关键就在把制度机制做深做实,让生态价值在市场中可度量、可交易、可受益。

从“两山”到“碳价”,从理念到机制,中碳登五年多走过了一条把生态文明思想制度化的路。生态文明,既是价值理念,也是治理体系;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碳市场正是让二者相向而行、双向奔赴的一座桥。沿着这座桥走下去,生态优势将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绿色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鲜明的底色。

(作者为武汉市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副教授)

让『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李芬

青马在线

技术可以复杂,生活不可以复杂

江抒阳

近期,一位老人在回家路上用手机,面对手机弹窗不断弹出,无法继续操作,在车站一时无法顺利返程。

这件事值得谈谈,回家的路并没有变远,人与人之间却多了一道看不见的“数字门槛”。当智能技术越来越深地嵌入日常生活,我们究竟以什么为尺度评价智能化?是系统更高效、机器更聪明,还是人的生活更自主、行动更便利、选择更有保障?过去讨论数字鸿沟,更多关注“有没有设备”“会不会使用”。如今,一些人即使拥有智能设备、进入数字系统,也可能因为界面复杂、流程繁琐、信息干扰、替代渠道不足,难以顺利完成现实事务。

从实践观点看,技术不是脱离人的独立力量,而是人的实践能力的延伸。智能技术能够承担更多信息处理和复杂任务,但技术自身能力的增长,只有转化为人的现实能力,才具有完整的社会意义。技术进步的方向,应当是让人处理现实事务更加便利,而不是让人为了使用技术不断增加学习和适应成本。技术可以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的生活不

应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的复杂,应当留在系统内部;技术的便利,才应当抵达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这里需要警惕一种“技术异化”:当技术规则凌驾于人,人为了迁就系统而不断调整自身,技术就从服务人的手段变成支配人的外在强制。评价智能化成效,不能只看系统效率是否提高,还要看这种效率能否真正转化为人的现实便利;判断智能技术是否真正进步,不能只看机器变得多么聪明,还要看人的行动能力是否因此得到扩展。

还要看到,数字弱势并非某种固定身份。老人可能不熟悉弹窗,年轻人也可能因手机没电、网络故障、系统崩溃而受阻。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些场景中暂时成为“数字弱者”。因此,适老化改造、无障碍设计、容错机制和人工兜底,不是少数人的特殊照顾,而是面向所有人的公共安全网。

购票、挂号、办事、支付越来越多地通过移动应用和数字平台完成,设备、网络和数字操作能力也随之成为进入服务流程的重要条件。当原本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完成的事务被压缩到单一数字通道,技术条件就可能转化为获得服务的现实门槛。

公共服务面向全体人民,其公共性决定了服务方式必须能够覆盖不同能力、不同处境的人。公共服务数字化改变的不只是办理方式,也在改变人们进入服务体系的条件。统一的数字能力,不能成为获得基本服务的事实前提。

人工服务、线下渠道和必要的替代方式,应当成为数字化公共服务的基本组成。技术设计也应以人为本的差异性为现实前提,避免统一的技术标准在具体使用中转化为新的进入门槛。真正成熟的智能社会,不只是让人能够顺利进入数字系统,也应保证人在暂时不能依赖数字系统时,仍然能够正常生活。

一位老人因手机弹窗滞留车站,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智能化发展的尺度。在智能化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能停留在价值宣示上,而要落实到技术设计、服务供给和社会运行之中。

(作者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